



# Dialectic Materialism and the Object's Preponderance: from Adorno to Zizek

Hu Daping

**Abstract:** The theory by Slavoj Zizek, according to his own description, is purported to rehabilitat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when he faces the predicament met by communist movement as a brutal fact,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subject of enlightenment within the vision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al epistemology and strive to offer a legitimate argument to the hegemonic struggle under the context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materialism” established in the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by Zizek is ground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ept of “the Object’s Preponderance” which is a significant and basic concept proposed by Theodor Adorno, and Zizek utilizes it in a different dimension. For Adorno, the core of dialectic is the idea of “non-ident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lso as object) and object (also as subject). By emphasizing the primacy of object, Adorno regards the idea of non-identity as the premise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Adorno, however, does not negate the human spirit per se; by contrast, through criticizing subjectivity and ideology, he endeavors to open up a brand new historical horizon, i.e., admitting and recognizing contradiction as an inevitable property of human spirit. The “negativity” of dialectic reiterated by Adorno is based on such contradiction and is to break down the concept of fetishism as well as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rationality, therefore creating an open prospect for human existence on the ground of antagonist natural history. Zizek argues that Adorno insists some kind of pre-established harmony and tries to wipe out alienation by naturalizing the history. On such a stage, the concept of “object a” by Lacan is not just identical to the concept of “the Object’s Preponderance”, but also overcoming the deficiency of the latter. On the logical ground, Zizek proposes a distinctiv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with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from the angle of epistemology. According to Zizek’s perspective, the essential aim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is to assist subjects to finish the transition from “master signifier” to “object a”, thus driving an individual to recognize the falsity of his/her social identity and to confront his/her desire. The passage from “master” to “object a” is mechanically a kind of dialectic in which an individual admits he/she is a split subject who cannot acquire identity between drive (the real cause which resists historization) and society (the symbolic order, or the mechanism of recognition). In the vision of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civilization is with antagonism perpetually and society cannot achieve the harmony-performed identit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Keyword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Frankfurt School; Slavoj Zizek.

**Author:** Hu Daping earned his PhD in philosophy at Nanjing University in 2000. He got the title of Changjiang Scholar of Young Scholar Program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15. Currently he is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Nanjing University, doctoral supervisor, deputy Dean of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His main interests are in the forming of Marxist philosophy, contemporary Western Marxism and radical social theory. His main works include *Post-revolutionary Aura and Global Capitalism*; *Sublime Ambiguity*;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Philosophy of Western Marxism* (co-author); *Back to Engels*; *City and Human*, etc.. His main translated works include *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 Six Essays on Women and Causality* by Slavoj Zizek;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Contemporary Dialogue on the Left* by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Zizek; *Space of Hope* by David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by David Harvey and so on.

南  
國  
學  
術  
思  
想  
者  
沙  
龍

# 辯證唯物主義與“對象優先性”

## ——從阿多諾到齊澤克

胡大平



**[摘要]**齊澤克稱自己的理論是在共產主義運動遭受挫折背景下的辯證唯物主義復歸；面對不可彌合的社會對抗性，他希望通過唯物主義的辯證認識論重建啓蒙主體，從而為全球資本主義語境下的霸權鬥爭提供合法性論證。齊澤克所稱的辯證唯物主義之“唯物主義”，前提是“客體（對象）優先性”來做保障的。其實，這本是阿多諾的基本觀點，但齊澤克的論證卻與阿多諾不同。阿多諾是將主體（同時作為客體）與客體（同時作為主體）之間相互作用的“非同一性”思想視為辯證法的核心；通過主張客體優先性，進一步將之視為人類“自然史”的前提。不過，阿多諾並沒有由此否定

人類精神，而是通過主體性批判與意識形態批判打開新的歷史視野，即承認人類精神之現實表現的矛盾性質。基於這種矛盾，他要求重申辯證法之“否定”性質，打破概念拜物教，推動理性進步，在對抗性的自然史基礎上打開人類生存的開放圖景。齊澤克認為，阿多諾通過把歷史自然化主張某種預定的和諧擦除了現實異化，而拉康的“對象a”概念雖與阿多諾“客體優先性”思想一致但克服了後者的不足。基於此，他便以拉康精神分析為依託，從認識論角度提出了一種非常獨特的辯證唯物主義。在齊澤克看來，拉康精神分析的根本目標是使主體能夠完成從“主人能指”到“對象a”（即“慾望的對象成因”）的過渡，從而使個人認識到他的社會身份之虛假性並直面自己的慾望，承認自己是一個被“驅力”與“社會”所擠壓並且永遠無法在這兩者之間獲得“同一”（即身份）的分裂主體，而從“主人能指”向“對象a”的過渡機制便是辯證法。在這種辯證唯物主義視角中，文明乃是永恆的“對抗性”，社會不可能達及概念上描述的表現為“和諧”的“主客體同一性”。

**[關鍵詞]**辯證唯物主義 法蘭克福學派 齊澤克

**[作者簡介]**胡大平，2000年在南京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2015年入選為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青年項目）”，現為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史、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後革命氛圍與全球資本主義》《崇高的曖昧》《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邏輯》（合著）《回到恩格斯》《城市與人》等，譯著有《快感大轉移：婦女和因果性六論》（[斯洛文尼亞]齊澤克）《偶然性、霸權和普遍性：關於左派的當代對話》（[美]拉克勞、巴特勒，[斯洛文尼亞]齊澤克）《自然、正義和差異地理學》（[美]大衛·哈威）等。

作為當代歐洲思想的制高點之一，阿多諾（T. W. Adorno, 1903—1969, 一譯“阿多爾諾”）重構了19世紀的黑格爾—馬克思高峰，並對其進行了內在爆破。所謂的“後馬克思主義”思潮，便是在這一爆破產生的廢墟上重建的當代批判理論。這其中，拉克勞（E. Laclau, 1935—2014）、墨菲（Chantal Mouffe）的狹義“後馬克思主義”思潮，代表着以“對抗性”這個碎片為核心的重述政治過程並使之激進化的努力。經由“後馬克思主義”而佔據當代激進理論之拱頂石位置的齊澤克（Slavoj Žižek），試圖以拉康（J. Lacan, 1901—1981）的精神分析的名義使“社會”成為名符其實的廢墟，使阿多諾“非同一性”思想之“消極”表述轉化為積極訴求，即以“對抗性”為前提，追求“不可能性”。本文旨在通過“客體（對象）優先性”（The Object's Preponderance）<sup>①</sup>問題，闡明齊澤克頗有爭議的“辯證唯物主義”自我主張中的阿多諾思想底蘊，揭示以其為代表的當代激進政治學從認識論上的失敗向本體論上的“不可能性”轉化之意味。

## —

齊澤克在其成名作《意識形態的崇高對象》中，公開主張“後馬克思主義”立場。不過，近年來他似乎又向原初的馬克思主義“回撤”，不僅反復重申辯證唯物主義立場，而且要求“回到列寧”，甚至在訪談中毫不顧忌地稱自己是斯大林主義的哲學家。這種“變化”，使得其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變得撲朔迷離。

齊澤克代表的是後現代氛圍中挑釁性認識論唯物主義立場，即以反本質主義名義把認識上的失敗轉化為本體論上的“不可能性”，以偶然性來維持歷史的“開放性”，從而為“霸權鬥爭”的合法性進行辯護。它不僅在實質上迴避了傳統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分的本體論根據，而且在認識論上也試圖擺脫必然性（客觀因果性或歷史規律）的糾纏，走向徹底的偶然性崇拜（這是否定宏大敘事的整個後現代知識之核心特徵）。然而，還不能因此簡單地指責這種“唯物主義”之虛假特徵。因為，複雜的是，齊澤克試圖藉由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的辯證法形式改變結構主義思潮之“唯心主義”形象，從而為當代激進政治學提供一種與馬克思（K. H. Marx, 1818—1883）的再連接。要理解其理論邏輯和意義，需要審視他與阿多諾的關係。這個關係正是齊澤克與馬克思之間關係的“消失的中介”，它是通過“對象優先性”這個觀點得以表現的。

在齊澤克的文本中，時常會看到阿多諾的觀點，但不太容易直接看到他的理論邏輯不僅受阿多諾的影響、而且是接着往下說的。<sup>②</sup>齊澤克表示，自己熟悉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但他又否認受到了其影響。在總體上，齊澤克強調阿多諾的唯物主義方向是重要的但存在着內在僵局，並且在政治上是消極的。<sup>③</sup>然而，正如他們都欣賞“唯獨最遠的遠方纔是鄰近”這句辯證法名言一樣，齊澤克表面上對阿多諾的漫不經心，恰恰暗示着他們密切的親緣關係。這種關係，在其文本中也留下了極為少見但重要的說明，這便是他的《快感大轉移：婦女和因果性六論》的第一、二章。<sup>④</sup>

在這本著作中，齊澤克以阿多諾、馬爾庫塞（H. Marcuse, 1898—1979）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對精神分析修正派的批判及其內在困境的解讀作為鋪墊，來說明拉康派精神分析之合理和優勢，明確地主張拉康的“對象a”便是阿多諾“客體優先性”觀點的發展和替代，成功地為拉康後

<sup>①</sup> “Object”有兩種中文譯法：“對象”或“客體”。這需要依語境而定。阿多諾的討論涉及“主體—客體”關係問題。按慣例，“The Object's Preponderance”譯為“客體優先性”；在齊澤克那裏，譯為“對象優先性”更佳。因為，在拉康精神分析語境中，“object”多數時候指的是那種不能以客觀實在形式直接顯現的對象。例如，上帝，剩餘快感，等等。

<sup>②</sup> 阿多諾《否定辯證法》的許多重大觀點在齊澤克的論述中一直都起着核心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說，他正是試圖借助於“否定辯證法”思想把拉康拉到當代批判理論制高點位置的。除“客體優先性”問題外，關於古典哲學（康德、謝林、黑格爾）的核心評價，關於克爾凱郭爾等人的判斷，關於拜物教的理解，齊澤克的基本觀點與阿多諾極為相似；甚至其《易碎的絕對》（The Fragile Absolute）也讓人想起阿多諾的“Fragility of truth”一語。最重要的是，貫穿於齊澤克理論中心，構成其前提的反本質主義的“同一性批判”以及“非同一性”或“對抗性”思想，不是別人，正是阿多諾的思想遺產。

<sup>③</sup> [斯洛文尼亞] 斯拉沃熱·齊澤克：《實在界的面龐》（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季廣茂譯，第X頁。

<sup>④</sup> [斯洛文尼亞] 斯拉沃熱·齊澤克：《快感大轉移：婦女和因果性六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胡大平等譯。

期對真實之維的關注進行了唯物主義辯護。通過簡要闡明阿多諾、馬爾庫塞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對精神分析“修正主義”理論以及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成果，齊澤克認為其以“壓抑性反升華”概念為代表的理論創見為分析“極權主義”社會（在齊澤克看來，這正是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徵）打開了空間，阿多諾的“客體優先性”立場亦為唯物主義的精神分析之發展描述了方向，不過阿多諾卻走入了死胡同。在齊澤克看來，阿多諾的“客體優先性”概念引入了一種“反中心”的思想，驅散了精神分析修正派試圖將本能歷史化（即主體化）的主觀唯心主義錯誤，不過這一思想亦包含着一個潛在的矛盾，即實際上傾向於擦除異化，通過把歷史自然化而主張某種預定的和諧；而拉康的“對象a”概念是從法蘭克福學派引申出來的，並且把阿多諾沒有想通的問題理論化了。<sup>①</sup>也就是說，拉康解決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難題。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論證中，貫穿的是關於精神分析之科學性質的理解。齊澤克強調，“明確提出精神分析是一門科學，質疑解釋學和因果解釋的對立的祇有兩家：法蘭克福學派和雅克·拉康”<sup>②</sup>。也就是說，拉康與法蘭克福學派相通之處在於，他們都試圖打破社會研究中的嚴格決定論和綫型因果假設，他們都看重作為解釋學的精神分析之獨特的回溯性因果假設。如果說，齊澤克一直抓住拉康不放，努力以其作為理論支撐批判當代意識形態，這是基本原因，那麼，人們也因此能夠清晰地理解，他為什麼一直致力於通過大眾文化來解釋拉康，改變其標準的“薩滿師”（shaman）形象使之清晰而通俗易懂，他為什麼亦同時糾纏於拉康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係，以及他本人何以採取了那樣的言說風格。焦點在於，一方面，正是在意義解釋學方面，拉康把“回溯性因果”“過度決定”“徵兆解釋學”等理論發揮至極，描述了一種意義生成、流傳、變化的複雜而吊詭的機制，指明文化現象之內在的非同一性和相互聯繫；另一方面，他同時把弗洛伊德（S. Freud, 1856—1939）的“微積分”比喻弄假成真，使精神分析演化為具有數學嚴謹性和神秘性的邏輯工具。對於齊澤克來說，精神分析是面向人類生存之悖結的不可能事業，正是這一點纔使它始終散發着獨特的思想魅力。在根子上，他的目標是通過對德國古典哲學的重新解讀尋找回應當代主體困境的非同一性（即矛盾或否定）辯證法思路。這正是阿多諾的思路，但齊澤克又不願意接受阿多諾的“消極”立場而是採取了阿爾都塞（L. P. Althusser, 1918—1990）在理論上的進攻姿態（即哲學上的階級鬥爭）。把這兩者結合起來又迴避其理論局限的正是拉康。一方面，拉康為解決阿多諾的停滯提供了思路；另一方面，拉康恰恰又彌補了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的不足。

齊澤克從邏輯上描述了阿多諾到拉康的連續性和斷裂，但他在結論上卻作了相反的強調，即拉康是正確理解阿多諾的前提。齊澤克的這種做法，就如同他說黑格爾是第一個“後馬克思主義者”那樣（實際中心問題仍然是“非同一性”）。這種做法掩蓋了另一個可能的事實，即齊澤克本人正是借助於阿多諾的支撐使拉康通俗化的一——把拉康從其神秘的小圈子中拉出來。

## 二

正如齊澤克強調的那樣，在晚期資本主義被管理的社會中，阿多諾看不到任何希望。在此語境下，阿多諾採取了一個表面上消極的姿態，即轉向思想的自我批判。在他看來，對基本意識（或意識形態）的批判構成哲學的核心任務。這種批判，最根本的便是質疑概念、體系、本體論、形而上學等代表的先驗主體觀念，指認其實際上是以“同一性”邏輯為特徵的主觀唯心主義暴力。與之相對，他提出以“非同一性”思想為核心的作為“瓦解（disintegration）邏輯”的辯證法觀點，從而打開“解構”（destruction）的大門。<sup>③</sup>

阿多諾把同一性稱為唯心主義暴力。他從本體論和認識論兩個層次來清除它們對思想的影

<sup>①②</sup> [斯洛文尼亞] 斯拉沃熱·齊澤克：《快感大轉移：婦女和因果性六論》，第1章、第5頁。

<sup>③</sup> 這不是說阿多諾已經站在後現代立場。實際上，他與後來由利奧塔（J. F. Lyotard, 1924—1998）定義的“後現代主義”並無實質性關聯。不過，就其試圖徹底“瓦解”現代性觀念這一點來說，他確實是後現代“解構”立場的先驅。必須理解的是，在鐵籠形成之際，“瓦解邏輯”只是被迫採取的理論姿態。它表達的內涵是，理論即抗爭。

響，從而維持思想之最低限度的批判性時，“客體優先性”和“自然史”兩個來自馬克思的核心觀點在他的論述中被突出了。前者成為抗拒先驗主體的“本體論之錨”，後者則從認識論角度打開了對歷史的洞見，揭示了辯證法之批判精神的實質——直面矛盾或對抗性，通過對客體的批判打開對其承認之路，通過對主體的批判找到其生成之道。這是兩個密切聯繫在一起的重大理論問題，不過，由於技術上的原因，這裏祇集中於“客體優先性”。

首先需要點明的是阿多諾下列重大觀點：

正是通過轉向客體優先性，辯證法纔成為唯物主義的。<sup>①</sup>

這個見解，與馬克思關於自己的唯物辯證法與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之間關係的解釋是一致的。其核心在於對世界客觀性的承認，也即強調辯證法首先是客觀世界運動的規律。阿多諾晚年之所以在《否定辯證法》中既反對唯心主義的同一性暴力又承認自由的可能性，其基礎正在這裏。按照辯證法的理解，自由不是主體的想像，更不是主體將自身意志強加於世界的幻覺，而是“自然史”的必然趨勢。這也是為什麼在討論“客體優先性”時必須涉及“自然史”的原因。當然，阿多諾強調“客體優先性”並非要回到教科書式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邏輯，把歷史比作無人看管的列車，恰恰相反，他要求把自然史邏輯支配下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已變得無人看管的歷史列車重新看管起來，同時又要堅決地拒斥唯心主義的同一性（即主客體同一性）思路。如何可能呢？辯證法正是回應這個問題的唯一合理思路，但這是以正確理解辯證法為前提的。“客體優先性”正是防範在辯證法問題上以盧卡奇—薩特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唯心主義思路扭曲的必要前提。

阿多諾指出：

對象，非同一性的肯定表現，祇是一個術語上的面具。一旦客體變成認知對象，它的物質屬性通過轉化成認識論和借助某種還原（一般來說，在方法論上，胡塞爾的現象學最終規定了這種還原）從一開始就精神化了。當知識批判中不可相融的主體和客體範疇開始變得虛假時——即不再完全彼此對立時——這也意味着：客體之客觀屬性，即不能被精神化的部分，祇有從服從於主觀目的的分析那種視角看纔被稱為“客體”。在那種分析中，主體的首要地位似乎是不成問題的。<sup>②</sup>

在這裏，阿多諾首先是把“客體”概念看成是一個認識論上的概念。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唯名論，具有人們今天所稱的反本質主義特徵。通過這一點，他要解釋人們經常處在其中的那種認識論的困境：由於認識本身不可避免地將人們所稱客體的東西主體化了，即他所言的“精神化”，這往往使人們將這一部分客體納入了主體範疇或者把純粹屬於對主體的理解“錯識”（“錯識”，是針對嚴格的主客二分標準來說的）為客體本身的屬性，所以從絕對的主客二分來看待世界是錯誤的（虛假的）。相反的情況也存在，即認識本身已經把主體作為一個客體（對象）看待了，因此往往將不能精神化的部分“錯識”為客體。前一種情況的典型例證是“本能”。在嚴格意義上，它是一個客體概念；不過，當人們說語言也是人的本能的時候，就將其主體化了。後一個典型例證是“語言”。它是屬於主體的範疇；不過，當人們因為語言不受個體使用者支配而強調其客觀屬性時，人們就將其視為客體了。這些例子說明，人們祇是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來定義主體或客體的，而不是真正堅持了主體與客體的邏輯定義，或者說假想的公認科學標準。正是在這裏，實質表現為主體唯心主義的同一性和體系思想成為批判的對象。

其次，當人們說“客體優先性”具有“本體論之錨”的地位時，這僅僅是在比喻意義上講的，通過參照傳統哲學來強調其意義。阿多諾本人是反本體論（反本質主義）的，他並不會因為反對主體之唯心主義暴力而矯枉過正地使主體屈從於客體規律。相反，“非同一性”乃是主體（同時作為客體）與客體（同時作為主體）之間相互作用的思想。這便涉及主體與客體的區分。這種區分本身與它們之間的關係認識就是一體的，如阿多諾所言，對主體和客體進行思考時，就提出

<sup>①②</sup>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4), 192, 192-193.

人們將要論及什麼的問題。

阿多諾還強調，“主體”和“客體”這兩個詞是多義的：

例如“主體”，可以指特殊個體，可以指普遍屬性，也可以指康德的《導言》中所說的“普遍意識”。這種歧義不是簡單靠澄清術語所能改變的，因為這兩個意義相輔相成，缺少一個就很難領會另一個。……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試圖給“主體”和“客體”這兩個術語下定義來避免這種類混亂的話，我們就會像康德以來的現代哲學一再提示的那樣，陷於一種理論上的困境，繼而加添了下定義的種種疑難，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主體”和“客體”的概念——或者確切說，它們所表示的東西——先於一切定義優先考慮。下定義意味着從主觀上利用一固定不變的概念去捕捉某種客觀的東西，不管它本身可能是什麼樣的東西。因此，“主體”和“客體”是難以給它們下定義的。<sup>①</sup>

在這裏，阿多諾似乎給人們出了一個難題。因為，如果缺乏定義，人們的討論可能會陷入雞與鴨講的境況，思想勢必陷入混亂。當然，這肯定不是其目標。實際上，阿多諾試圖表明，主客體二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面臨的混亂遠大於其理論上的清晰性，特別是基於某種預先設定的同一性概念進行的僵化主客二分必然會發生主客顛倒。他尖銳地指控了傳統哲學的這一問題：

通過剪裁範疇，傳統哲學向那些異於它的東西施加魔法。用黑格爾的話來說，主體和客體都不祇是“被設定的”。祇有這種觀點纔充分地解釋了為什麼不能將用“主體”和“客體”這些詞所裝扮的對抗解釋成原始的事實。如果能夠這樣來解釋，那麼精神將會變成身體的徹底的他性，而與其固有的肉體屬性相矛盾；不過，祇讓精神來取消對抗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將反過來實質性地使其精神化。在對抗中表現出來的兩種東西具有同等的地位：追求凌駕主體之上並從其那裏回撤的東西，以及我們時代與主體——實際上，也即是客觀性優先地位的顛倒形式——不能一致這個事實。<sup>②</sup>

為克服這種難題，阿多諾試圖表明，主體與客體的分離既是真實的又是虛假的。“真實”是在認識論層次上說的，這種分離表現了關於人的狀況的二分法，表現了一種強制的發展；“虛假”是就其不能在本體論上加以確認來講的，更何況它們之間的分離也並非一成不變的。由此，在認識論上把主體與客體區分出來並強調客體的優先性，絕非把排除人的原始世界作為客體，而是排除“先驗主體”之隱蔽的本體論地位。所以，他強調，“我們一旦承認客體的辯證的首要性，那麼對作為扣除主體剩餘物的客體的非反思的實用科學的假設就將站不住腳”<sup>③</sup>。同樣，客體的無主體剩餘物並不比主體設定的剩餘物來得多。他又說道：

事實上，主體也是一種客體；主體祇不過在它形式的本質方面忘卻了自己是怎樣構成和依靠什麼而構成的，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打擊了主體的嚴格客體化，打擊了物化的現實。它的真實內容決不是本體論的，而是主體和客體之間歷史地積聚起來的障礙。主體由於要求凌駕於客體之上並進而騙取客體自身而建立這種障礙。因為主客體的真正非同一性，客體越是遠離主體，主體就越要“構成”客體。<sup>④</sup>

這意味着，客體的首要性並非抬高作為主體的抽象對立面的客體，而恰恰反對主體的物化。

再次，主張客體優先性便是對統治着歐洲思想的主體觀點之最嚴厲的批判。《否定辯證法》的核心目標是鏟平先驗主體這個現代西方思想的阿基米德支點，因為它支撐起來的正是嚴格的等級制，尤其是主體對作為客體的自然和人的統治。阿多諾與霍克海默（M. Horkheimer, 1895—1973）已經在《啓蒙辯證法》中通過對歐洲思想史的審理闡明了那種統治的邏輯。與《啓蒙辯證法》不同的是，在《否定辯證法》中，阿多諾把整個人本主義傳統（包括盧卡奇開闢的西方馬克思主義

<sup>①③④</sup>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外國哲學研究室 編：《法蘭克福學派論著選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上卷，第208—209、217、219頁。

<sup>②</sup>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194.

人本主義）都送上了審判台，將其視為唯心主義暴力，並將同一性思維視為根基。他強調說：

主體的首要性是達爾文式生存鬥爭之精神化的持續。基於人類目標對自然的壓迫祇是一種純粹自然的關係，為什麼自然控制理性及其原則至上性乃是一種幻覺，原因便在於此。當主體聲稱自己是一個培根式的萬物之主，並最終是他們空想出來的創造者時，便把一種認識論和形而上學的東西塞進了這種幻覺。其原則的實踐使得其成為它認為自己正在統治的東西的一部分；就如黑格爾式主人那樣屈從於他統治的東西。它表明了主體在消費客體過程中束縛於客體的程度。主體所為就是主體受制於自身魔法而相信的那種東西的魔法。主體孤注一擲的自我拔高便是它對自身無能之體驗的反應，那種體驗阻礙着自我反思。絕對意識就是無意識。<sup>①</sup>

在此，阿多諾清晰地闡明了笛卡爾式主體之含義。在他的全部研究中，他指認過，笛卡爾式主體首要性思想最後在費希特（J. G. Fichte, 1762—1814）那裏轉化為對客體優先性的厭惡，並且制度化了，而結果則是主體在商品世界中的全面物化。

物化問題是盧卡奇（C. Lukács, 1885—1971）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抓住的中心問題，阿多諾既沒有重複盧卡奇的批判，亦沒有走這一邏輯。在阿多諾看來：

儘管客體具有優先的地位，但世界的物性也是能夠直接體驗到的。這種物性誘使主體把自身的生產的社會環境歸於自在之物。這一點在馬克思論拜物教的一節裏已被闡明了，該節實際上是來自德國古典哲學遺產的一部分。甚至德國古典哲學體系的動機也幸存於這一節中：商品的拜物教特性並不歸罪於主觀上的錯誤意識，而是客觀上從社會先驗、交換過程演繹出來。

馬克思已經表達了作為批判產物的客體優先性地位與其現存的漫畫、商品特性對其的歪曲之間的差別。作為一個過程，交換具有真實的客觀性，但同時客觀上又是不真實的，違反了其本身的原則，即平等原則。這是其為什麼必然產生虛假意識，即市場偶像的原因。祇是在諷刺意義上，商品交換的社會自然增長纔是自然法則，經濟的支配地位不是不變的。<sup>②</sup>

阿多諾認為，源自市場的現代社會物化正是馬克思所強調的客體優先性地位的顛倒，這種顛倒並不能從相反的主體優先性地位來解決。因為，主體優先性地位正是交換價值統治的必然要求和產物。人本主義認識論把客觀性還原為主體。在同一邏輯中，先驗主體作為一個純粹的抽象，實際上是一個純粹的對象（客體）。這種抽象不是別的，正是交換過程的產物。阿多諾出其不意地引證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對拉薩爾派“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這個觀點的批判，來說明“非同一性”觀點的重要意義和純粹抽象之誤：“交換價值對人類的普遍統治，先驗地使主體遠離了主體化過程，並且使主體性本身貶為一個純粹的對象。這種統治製造了主張確立主體優勢地位的一般原則這種謊言。先驗主體之剩餘乃是徹底被蒸發的經驗主體之虧空。”<sup>③</sup>

最後，阿多諾試圖通過主體性批判與意識形態批判打開新的歷史視野。在阿多諾看來，正是在交換價值普遍統治下，先驗主體漸成真理，形成了現代社會之極端的意識形態情形。這也是盧卡奇關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二律背反之論斷的基本含義。盧卡奇之所以將意識形態置於現代性批判的中心位置，基本原因也在於此。在問題的性質及其成因判斷方面，阿多諾與盧卡奇是一致的。面對盧卡奇批判思路之失敗，阿多諾在開啟新的方向時必須對那種失敗進行反思：

意識形態批判的任務是判斷主觀的和客觀的份額及其動力。通過將其還原到社會主體，它否認概念拜物教之客觀性，通過揭示其乃是騙局、寄生的非實在性以及其對精神的固有敵意；它也否定虛假的主體性，即那種有時不被察覺的掩蓋起來的主張：所有的存在都存在於

<sup>①③</sup>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179-180, 178.

<sup>②</sup> [德]阿爾多諾：《否定的辯證法》（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張峰譯，第188頁。譯文略有調整。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190.

精神之中。

由此可以看出，阿多諾是雙重作戰的——既反對概念拜物教，又反對虛假的主體性。在其中，至關重要的是：

批判思想的目標不是把客體置於曾被主體佔據的孤單的王位上。在那個王位上，對象祇不過是一個偶像。批判思想的目標是廢除等級制。<sup>①</sup>

在他看來，“拯救人類的唯一途徑是通過主體意識。如果主體意識被消滅而不是在更高的形式中被揚棄，其後果將倒退——不僅是意識的倒退，而且是倒退到真正的野蠻狀態”<sup>②</sup>。在這一點上，阿多諾與馬爾庫塞是一致的。即便在他們身上都可以看到尼采（F. W. Nietzsche, 1844—1900）的影子，也試圖以本能造反邏各斯的路線尋求救贖道路，但在骨子裏卻是呼喚更高形式的理性，而不是主張超人。並且，正是基於“更高形式的理性”，必須重新審視作為社會基本性質的“對抗性”<sup>③</sup>，以及“今日社會通過撕裂它的東西而殘存”這個事實<sup>④</sup>。

阿多諾強調，我們應該認真思考一下，對抗到底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這個問題十分嚴肅。泛泛地說，它涉及全部的歷史敘事——究竟是衝突的歷史還是走向和諧的歷史。更直接地說，它關乎馬克思唯物主義基本思想。馬克思在公開闡明唯物主義歷史觀核心原因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宣佈過：

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裏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裏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着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sup>⑤</sup>

阿多諾認同馬克思、恩格斯（F. V. Engels, 1820—1895）關於任何社會都具有偶然性和暫時性的看法，並將之視為辯證法的要義，也十分推崇他們在政治上的不妥協精神，但他懷疑他們“第二天就發生革命”的期待，也懷疑他們的“經濟關係革命”主張是否足以能夠解決自由難題。在他看來，對抗性一經產生，便成為人類生存的必然性。這使得他堅定地反對黑格爾式的總體的世界歷史觀，要求重新審視馬克思的“自然史”之批判意義。正是在那種自然史觀念中，客體優先性既粉碎了個人的傲慢，又孕育着打破在資產階級時代被神秘化的自然規律之趨勢。因為，矛盾、對抗性、非同一性，正是自然史的基本事實。

總之，主張客體優先性，並進一步將之視為人類“自然史”的前提，目的在於粉碎近代西方確立的主體神話。在阿多諾看來，正是“啓蒙”通過同一性思維製造了將自身作為絕對的主體之幻想，從而推動了商品世界的物化。但是，阿多諾並沒有由此否定人類精神，“人類精神既是真實的，又是幻景。它是真實的，乃是因為任何東西都不能免於它已經使其獲得純粹形式的那種統治；它是不真實的，乃是因為與統治發生聯繫時，它不過是它自己相信並主張成為的那種精神”<sup>⑥</sup>。也就是說，他指認了人類精神之現實表現的矛盾性質，這種矛盾性質乃辯證法使然。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笛卡爾（R. Descartes, 1596—1650）、康德（I. Kant, 1724—1804）、謝林（F. W. J. V. Schelling, 1775—1854）、黑格爾這些近代先賢的理論體系大多具有內在的張力。阿多諾的要求則是通過重申辯證法之“否定”性質，打破概念拜物教，推動理性進步，克服那種矛盾，在對抗性的自然史基礎上打開人類生存的開放圖景。

<sup>①⑥</sup>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181, 186.

<sup>②</sup>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外國哲學研究室編：《法蘭克福學派論著選輯》，上卷，第210頁。

<sup>③</sup> 對抗性，用英文來表達，具有兩種形式：“opposite”和“antagonism”。前者為黑格爾辯證法用語，即對立面；後者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用語，即不可調和的矛盾。在阿多諾這裏，首先是“opposite”，即概念/物、主/客等等對立關係；其次纔是“antagonism”，即社會之不可解決的矛盾性質。在歸根結底意義上，它們都是對矛盾的不同表達。阿多諾反復強調概念的矛盾性質，即概念同它所指的物是矛盾的，要麼缺失了什麼，要麼塞進了不屬於它本身的東西，也強調現實的矛盾特點。

<sup>④</sup> Theodor W. Adorno, *Lectures On Negative Dialectics: Fragments of a lecture course 1965-1966*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2.

<sup>⑤</sup>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卷，第33頁。

## 三

齊澤克雖然肯定阿多諾對現代社會的批判，亦認可其對精神分析的理解，但同時認為，阿多諾並沒有找到真實的出路。焦點在於，反中心的“客體優先性”概念不僅沒有證明主體的異化，反而預想了可能的“和諧”。實際上，如果注意“否定辯證法”思想對矛盾和對抗性的強調以及以其為內容的“自然史”敘事視角，人們就看出這種批評乃是刻意的“誤讀”。因為，阿多諾的“自然史”概念表達的是“對抗性”支配着人類歷史之事實，他不可能預先設定“和諧”；而他之所以仍然設想“和諧”的可能性，乃是尊重人類精神進化的事實，具體表現在通過自我批判而在“否定辯證法”支持下走向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解。這正是他為什麼在後期集中於“否定辯證法”主題的關鍵原因：不帶肯定的否定。作為辯證法的基本性質，它開啟了人類在“被迫選擇”中走向自由的可能性。由此看來，齊澤克對阿多諾的批評，有意壓抑了這一至關重要的維度。

齊澤克理論的核心主題是經由拉康為笛卡爾式主體進行辯護並由此揭示當代意識形態的複雜格局，從而推動全球資本主義批判。這樣做的原因是，拉康晚期起核心作用的“真實”（the Real）概念指認了主體的對象成因，而作為抵制主體化—象徵化過程的殘餘，“真實”表明了主體之創傷性內核，表明了主體作為“分裂主體”存在的事實。從批判角度說，齊澤克這一立場比簡單地否定主體的後現代思潮更深刻，但也不是沒有自己的難題。其中之一是拉康的理論直接源自精神分析經驗，將之推及更廣泛的社會層次，存在衆多爭議。齊澤克將拉康與阿多諾進行連接，正是其將拉康置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史，在邏輯上闡明其激進位置的重要舉措。

### （一）為什麼拉康是當代主體的救星？

齊澤克打着拉康的幌子，既有邏輯上的原因，又有政治上的原因。簡言之，齊澤克試圖通過拉康理論拯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主體”（觀念）。

20世紀70年代以後，受法國“（後）結構主義”影響，美國學院左派引領的激進政治話語把“主體”送上了審判台，這成為新激進主義的最顯著特徵。在表面上，對主體的質疑打開了新的政治視野，比如生態學、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等，都從不同維度揭示當代資本主義的中心性壓迫；但必須同時看到，正是在其批判獲得喝彩的時候，這立場之正面主張卻面臨的不可能：不是回到前現代（甚至是某種誤認的非壓迫性主體，如生態學的主體觀念），就是各種虛無縹緲不着邊際的邊緣想像（例如，後殖民主義的好戰性，女性主義主體觀念）。

從這一語境出發，不難得出結論：實際上，人們面臨的問題仍是馬爾庫塞所稱的理性主體的重建，即黑格爾理想的實現或馬克思主義歷史使命的重申。在邏輯上，齊澤克正是站在這一點上的，祇不過他的套路是借助拉康來重申黑格爾的辯證法。他的這種策略選擇，是直接受到了拉克勞、墨菲《霸權與社會主義戰略》一書的啓示。就此來說，他以《意識形態的崇高對象》一書而暴得大名並不讓人感到意外。因為，雖然齊澤克在該書的正文部分並沒有把自己的討論直接銜接到拉克勞、墨菲那本書的立場上，但在邏輯上恰恰完成了後者並沒有充分展開的論證，即今日意識形態的複雜局勢何以使霸權鬥爭成為社會主義的首要戰略。

在齊澤克看來，意識形態批判的重要任務，“不是將普遍性簡單地還原到一種在其之下的偶然特殊內容，而是使得作為空洞框架的普遍性與填充它的特殊內容永遠分離開來的鴻溝可見，即肯定作為‘空洞能指’的普遍性，為佔有其空洞的霸權鬥爭的戰場”<sup>①</sup>。這為齊澤克重新肯定笛卡爾式主體提供了一個簡潔的說明。普遍性就是一個戰場，為了佔領普遍性，就必須首先肯定普遍性是一個永遠不能填滿的空洞。這個觀點並不難接受，它實際上亦是拉克勞和墨菲的基本立場，齊澤克祇是以不同的方式重申了它。值得注意的是，齊澤克不主張傳統意識形態以特殊內

<sup>①</sup> [斯洛文尼亞]齊澤克：《自由的深淵》（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王俊譯，第65頁。

容來否定特定的普遍主張，而是要求承認普遍（形式）和特殊（內容）之間的永遠不能消除的對立，從而保持普遍性本身的開放性。這一點正是阿多諾關於當代意識形態批判主張的核心。不同的是，在阿多諾否定本體論思維之後，齊澤克試圖通過拉克勞、墨菲關於本體論與本體的反本質主義區分，重新藉由對主體的本體論身份論證打開新的地平。拉康在這裏可以發揮其核心作用，因為拉康的作為“空洞能指”（即被與其所指阻隔開來的“能指”，或“分裂的”能指）的主體觀不僅為解決現代主體難題，而且為避免各種後現代批判之失誤提供了重要的啓示。

拉康的主體觀，是對作為人被迫選擇主體這個事實的回應。這種被動性，也是哲學亘古的主題，它的另一種（相反的）表達即是自由。由此不難理解，為什麼在20世紀50—60年代會發生從薩特（J. P. Sartre, 1905—1980）代表的存在主義向所謂（後）結構主義的思想轉換，因為這種轉換的實質便是從自由（積極的主體性）轉向結構（消極的位置）。當然，結構主義的“無主體”觀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而祇是以結構的語言表達了人之“在世中”被拋的那種困境。

在齊澤克看來，拉康打破了這一種狀況：

拉康以一種史無前例的姿態表明了嚴格的相反立場：弗洛伊德的“無意識”與我們總是作為當事人被嵌入其中的生活語境之結構上必然的和不可還原的不透明性沒有任何關係；相反，“無意識”是無身體的理性機器，它自己追求不顧主體生活要求的道路；就其在起源上是一種“脫節”（out of joint），與其語境化的情境處於衝突之中。它代表着理性主體：“無意識”是一個裂縫（crack），它塑造了不同於“在世中”的主體之原始姿態。<sup>①</sup>

拉康表明，理性主體本身便是無意識主體，它在起源上便處於“在世中”的矛盾之中。面對這種矛盾，海德格爾（M. Heidegger, 1889—1976）要求向後看，試圖維護作為“原始”的世界本身的高貴性。這既是一種虛偽的浪漫主義，又容易產生對以納粹形式表現出來的虛假的英雄主義崇拜。與之相反，各種後現代主體性則因為恰當的象徵秩序缺失而引發的“想像的理想”之直接超我化，陷入阿多諾所稱的“唯心主義狂怒”之中。不過，在各種後現代版本中，德里達（J. Derrida, 1930—2004）的位置又是特殊的。他試圖通過永不停息的解構行動來維護作為“幽靈”的思想之尊嚴，從而保持向前的開放性。就此而言，德里達與海德格爾又構成一種顛倒的兩面性。這種兩面性之相通，乃是他們對思想的執著。在海德格爾那裏，思想即道路；在德里達那裏，解構即正義。齊澤克熟悉兩者，他贊同他們共同的反本質主義立場和對形而上學的批判，但又不同意兩者在主體問題上的極端立場，而是試圖以拉康來維持他們的批判性同時摒棄對某種原始自由的懷舊（海德格爾）和不着邊際的彌賽亞情結（德里達）。基於精神分析經驗，拉康肯定主體的實際狀態已是某種原始選擇的結果。保留主體概念就是要探明今日“主體”狀態與其選擇之間的關係。

當然，拉康的理論本身並不具有政治性質，而祇是在本體論上為激進政治表述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言說，其倫理學則為其後的立場提供了重要支撐。例如，其有關“不存在兩性關係這回事”、“不存在大他者”等本體論言說代表著徹底開放性訴求，其有關“穿越幻象”、“不要放棄慾望”等倫理口號代表著不妥協立場，這些都在當代新激進政治理論中得到廣泛的反響。不同的是，以拉康的主體理論為基礎，齊澤克不僅試圖推動對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批判，而且試圖糾正各種後現代激進政治學之誤，這使得他在全部激進理論中卓爾不群。

## （二）在什麼意義上拉康是唯物主義的？

齊澤克對拉康的運用，核心觀點便是藉由拉康從“S<sub>1</sub>”向“對象a”的過渡邏輯發揮出一種“對象優先”的辯證唯物主義立場。在拉康看來，精神分析的根本目標是“使主體能夠完成從S<sub>1</sub>到對象a的過渡”。在其中，“S<sub>1</sub>”和“對象a”是兩個數學符號，它們分別表示“主人能指”和“慾望的對象成因”。整個命題的含義是，使個人認識到他的社會身份之虛假性而直面自己的慾望，承認自己是一個被驅力（不能歷史化的因而真實存在的“原因”）與社會（以象徵表現出

<sup>①</sup> Slavoj Zizek,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9), 62.

來的語言交流秩序，即承認機制）所擠壓並且永遠無法在這兩者之間獲得“同一”（即身份）的分裂主體。這種表達方式，在形式上表明了一種重要的變化，即精神分析轉向了語言分析。拉康正是這種變化的最重要推動者。齊澤克正是藉由拉康把精神分析重新激進化、唯物主義化為一種新的批判理論，從而以其為利器來回應當代複雜的意識形態變化。在齊澤克看來，作為精神分析最後落腳點的“對象a”表達的是唯物主義“客體的優先地位”之基本立場，而從“S<sub>1</sub>”向“對象a”的過渡機制便是辯證法。由此，齊澤克以一種近乎神秘化的方式在當前馬克思主義因蘇東劇變而暫時撤退背景下出其不意地高舉起辯證唯物主義大旗。

齊澤克的結論很簡單，但整個論證過程特別複雜，這不僅涉及拉康含糊的術語和深澀的思想，而且與精神分析之技巧有關。簡單來說，拉康是用“想像”“象徵”“真實”三個概念構成的三元組合來解釋主體。這三者與弗洛伊德的“自我”“超我”“本我”概念具有對應關係，但含義又不一致。一致的是，拉康與弗洛伊德的三個概念都是藉由實體表示的三種功能；不同的是，拉康剔除了弗洛伊德具有生物學意味的“本我”概念，而將不可主體化的東西視為主體化（即象徵化）過程的殘餘，它祇是在事後纔可見而在事前則不“存在”。更為重要的是，在弗洛伊德那裏，主體是“一僕（自我）三主（本我，超我，現實）”結構，而拉康則將之喻為由“想像”“象徵”“真實”三者之間複雜關係構成的“博羅米恩環”（Borromean rings）或“拓撲”（topologie）結構。拉康用數學概念來描述主體的特點，強調了其不可解釋的特徵。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在拉康的教學中，不同階段的側重點並不一樣，大致存在着從早期的“想像”經由“象徵”向“真實”的轉移；另一方面，無論哪一個階段，拉康觀察主體的重心都是在語言，即主體之間的交往形式，因此也是話語問題。這正是其藉由結構主義語言學工具對精神分析的重大突破。從這一角度來看，這三個概念實際上代表著三種不同的語言交往境界：主體之間彼此以對方為鏡從而識別自身；主體通過認同象徵秩序並被其承認；總是存在不可象徵化的殘餘。這也意味着，其在邏輯上從語詞、象徵秩序再到不可象徵化的“真實”之不斷深化過程，見證了徹底主體化之不可能。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現實的主體總是殘缺的。

由於精神分析領域的限制以及語言學成果的運用，拉康的討論就其表述而言十分晦澀，也充滿歧義。在其關於主體之形式的論證中，主體首先是作為語言學上的能指出現的，這便是符號“S”的意思。這個“S”既可以说は“Subject”之首字縮寫，亦可以说は語言學中的“能指”（signifier）之首字縮寫。通過這種操作，至少在形式上，拉康解釋了弗洛伊德以來精神分析工作的一個難題，即如何表達無意識。在拉康看來，無意識即是能指鏈——通過一系列相互替代的能指表明存在着所指但其又不能清晰地呈現出來；笛卡爾式的“我思”主體便是無意識主體。他的任務便是說明這個主體的特徵；佔統治地位的主體觀念就是“所指的主體”、積極的當事人，以及在語言中試圖表達自我的指示作用的承擔者。祇不過，象徵再現總是扭曲主體，它總是一次次地位移和失敗，不能找到屬於“他自己的”能指。因此，這樣的主體最終表現為一個缺失：

如果我們進行抽象，如果我們不同主體模式之全部豐富性抽象掉，把個體“生活在他們主體位置上產生的體驗之全部豐富抽象掉，剩下的便祇是由這種豐富所填滿的空位；這種原始的空洞，這種象徵結構中的缺失，便是主體，能指的主體。因此，主體嚴格地與主體化結果相對：主體化過程標示出來的東西並非前主體的或超主體的書寫過程而是結構中的缺失，就是主體的那種缺失。<sup>①</sup>

繞了一個很大的彎子，表達了相近的結論：主體是結構中的一個空位。但拉康並沒有停留於此，因為這實際上並沒有超越結構主義的基本觀點，後者指認主體乃是結構中的位置，現實的主體乃是當事人。在邏輯上，純粹的主體便是拉康“象徵”概念所指涉的邏各斯世界、理性世界。全部結構主義的共同立場就在於證明主體是象徵結構中的空位。拉康的巧妙之處在於，借助於語言

<sup>①</sup> Slavoj 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2008), 197.

學，以能指來表示這個位置，從而以象徵化過程入手證明這個空位永遠不能被填滿。因為填滿了，那個空位便不復存在，這同時意味着主體也不復存在。雖然這祇是邏輯上的思辨，但確實道出了歐洲近代思想主體假設之悖論性質。拉康的理論成就不在於否定主體存在，而恰恰在於從這種不可能性出發出其不意地強調，現實的主體是存在的，雖然它總是以某種殘缺形式存在。其論證的核心在於，象徵化（即主體化）過程總是不可能完成的，總是存在着某種殘餘，它作為結果見證了主體的存在。對此，齊澤克做了一個清晰的解釋。他強調，在拉康的理論中：

主體不過是其自身指示性再現之不可能性，這種再現之失敗在大他者中打開了主體之空洞位置。這樣，我們就能明白，下列對黑格爾的通常責備是沒有意義的：黑格爾的辯證法“揚棄了”所在內在客觀的殘餘，包括辯證中介循環中的殘餘；相反，正是辯證法運動暗示了，總是存在着某種殘留、某種殘餘，它們逃脫了主體化、主體性佔有一中介的循環，而主體正是與這種殘餘關聯在一起的： $\$ \diamond a$ 。這種抵制着“主體化”的殘餘體現着“就是”主體的不可能性。換句話說，主體嚴格地與其自身不可能性關聯在一起；它的界限就是它的實際條件。<sup>①</sup>

這便涉及其著名的“對象a”和“真實”兩個術語。

對於多數拉康、齊澤克的讀者來說，“對象a”“真實”是兩個神秘莫測的術語。因為，它們有無數的表象，但卻無法給出一個精確的定義。對此，拉康、齊澤克應承擔責任，是他們的論述採取了精神分析實踐中的那種自由聯想，大量的比喻、類比在許多時候讓人一頭霧水。不過，與一般哲學概念不同，這兩個術語在嚴格意義上祇是承擔某種功能的數學符號；或者從語言學角度來說，是一個分析過程所使用的能指。它們可以視為同一個功能實體的不同表達方式，都是用以說明主體之對象成因的。在其中，“真實”是從象徵過程來理解的，而“對象a”則是從慾望（想像）角度來理解的。它們的核心特點是：事先並不作為原因而存在。齊澤克強調：

真實對象就是一個本身並不存在的原因，它總是存在於一系列的結果之中，並且總是以某種扭曲、位移的方式呈現。<sup>②</sup>

在邏輯上，“真實”以及作為其表現的“對象a”首先是作為結果體現，但人們卻必須將之作爲原因——回溯性因果關係的原因。這一邏輯乃是典型的精神分析臨床實踐假設。在神經症治療過程中，關於創傷的追溯便是典型。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這並非意味着“真實”不是事先就已經存在的實體。確切地說，“真實”既可能事先已經作為實體存在（例如，偶然的肉體因素），也可能是不具有任何實體身份的社會存在（例如，創傷性遭遇），也可能不存在（例如，剩餘價值，或者快感）。記住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拉康—齊澤克的焦點是借助於精神分析之回溯性因果邏輯來強調，主體乃是由慾望的對象成因建構的，而這個原因事先並不清晰（被無意識所壓抑），祇能通過慾望滿足過程之結果來透視。進行這種操作，與標準的結構主義在主體—主體之間關係（話語）中分析主體以及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以主體間性來建構主體不同，它試圖堅持主體—客體之間的辯證關係。不過，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主客體辯證法，而是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顛倒性運用。這是拉康—齊澤克最重要的分析程序：黑格爾的辯證法在他們的用法中似乎就是一種顛倒程序——結果與原因的顛倒，進而主體與客體位置的顛倒。在拉康看來，這種顛倒是不能解釋成因的，所以他經常使用數學上描述正面與反面之莫名其妙顛倒的“莫比烏斯帶”（Möbius strip）來比喻這種顛倒。當然，這也把理論帶入了更大的混亂。齊澤克試圖糾正這個問題，他將不能解釋成因的東西統稱悖論，並指認，悖論就是現實本身的性質。因此，拉康的比喻以及由它們代表的分析，便是通過回溯性（建構性）因果來解釋現實的這個特徵。說對象是通過快感而顛倒爲主體的成因，乃是因爲個體主體正是在慾望滿足過程中獲得主體感覺或意義的。精神分析尊重這個常識，但其比常識更深刻的地方是洞悉了這個過程總是一種失敗，因此指認主體正是內在分裂的主體。弗洛伊德關於生本能/死本能、快樂原則/現實原則甚至關於主體之自我、超我、本我的結構區

<sup>①②</sup> Slavoj 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2008), 236, 184.

分，無不指認主體是一個分裂的結構。在直接的意義上，拉康堅持了弗洛伊德的這一立場，並試圖徹底解決其有關本能、本我等假設的生物主義殘餘，所以他堅持作為客觀趨勢的弗洛伊德的“驅力”（drive）概念而壓抑“本能”範疇，剔除“本我”概念並將其顛倒為以結果形式呈現但通過回溯性分析可以發現的以原因起作用的“真實”——即在象徵過程中不被征服的殘餘。所有這一切，都是借助快感來說明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聯繫。當然，以快感作為中介時，這種關係相互作用的機制在拉康—齊澤克這裏也得到了新解——一種確實具有唯物主義性質的主體新解。

由於在拉康那裏，主體是一個能指主體，在象徵過程中，它祇能以另一個能指來表述它<sup>①</sup>，這便有了“S<sub>1</sub>”問題，即主人能指問題。“S<sub>1</sub>”是拉康用於表現主人能指的符號。按照語言學規則創造的術語，主人能指的含義無非是指堆在人們身上的頭銜、名號，它表示人的社會身份。在每一個人身上都有無數這種主人能指：第一類是人皆所有的，如作為人子、人父、男人……；第二類是職業特有的，如作為教授、南京大學教授、長江學者……；第三類是政治身份，如某個黨派成員；還有其他林林總總。每一種能指都從個體之外給他塞進本不屬於他自身的象徵內容，個體正是通過背負這些內容並將之在社會上扮演出來纔成為在象徵過程佔據主體位置的主體，即通過象徵化（認同象徵並被象徵秩序承認）而實現主體化。不過，拉康和齊澤克強調，這種象徵過程永遠是不可能真正完成的，即主體與社會之間不可能獲得想像中的和解，並要求在主體問題上從跟隨“S<sub>1</sub>”步伐的象徵轉移到“對象a”上。這便是由“對象優先性”保障的唯物主義的主體觀。齊澤克強調，正是在過度決定的解釋學因果關係中，創傷性的“真實”在嚴格意義上成為主體的原因。拉康指認，主體看到他自己作為一個缺失是由“a”促成的，這個“與a有關的\$”觀念闡明了阿多諾“客體的優先性”。<sup>②</sup>

齊澤克並非簡單把唯物主義作為真理的保障並通過這種強調來證明拉康的真理性。他的真正目標是，追隨弗洛伊德基本立場，強調文明乃是永恆的“對抗性”，社會不可能達及概念上描述的表現為“和諧”的“主客體之同一性”。在他看來，社會本身的可能定義便是“對抗性”或“不可能性”。如果人們注意到20世紀70年代由阿爾都塞出其不意地以“過度決定”論（即反經濟決定論的結構決定論）推動的激進政治學之葛蘭西轉向——以霍爾（S. Hall, 1932—2014）文化研究和拉克勞、墨菲的“後馬克思主義”為重要代表——把“霸權”置於理論焦點這個事實，就不難理解齊澤克這樣做的意圖：雖然是以精神分析這個獨特的視角切入的，但其解決了這種理論動態之本體論前提薄弱的困難。因此，當齊澤克以阿多諾的“客體優先性”作為參照系將其“非同一性”之認識論姿態轉向為本體論上的“對抗性”和“不可能性”時，他確實從激進政治學之唯物主義傳統為當代霸權鬥爭提供了普遍性前提。這也是為什麼他的成名是通過接着“後馬克思主義”話語往下說而實現的原因。

## 四

以“對象優先性”來為“對象a是主體的慾望成因”這個觀點的唯物主義性質進行辯護，齊澤克進行的是理論上的乾坤大挪移。人們可以從其理論旨趣角度承認齊澤克論證的合理性，但這種論證並非沒有問題。其問題不僅包括精神分析之專業限制帶來的理解困難，其學院派論述帶來的思辨難題，其對黑格爾以及馬克思辯證法之形式運用是否合理等等，而且最重要的是其辯證唯物主義主張在某種意義上使歷史“自然化”了，較之於他批評的法蘭克福學派恰恰是一種理論上的倒退。在更大的範圍內，他以精緻化的形式分析掩蓋了整個“後馬克思主義”由對歷史情境的尊重演化成偶然性崇拜之誤，這種動向在實質上否認了歷史進步的客觀可能性這個至關重要的唯

<sup>①</sup> 實際上，想像過程亦是如此。例如，鏡像關係，主體的自我認知恰恰是通過鏡子中的空洞形象（即另一個能指）進行，即主體總是必須把自己投射成為一個主體符號纔能夠進行自我認知。

<sup>②</sup> [斯洛文尼亞] 斯拉沃熱·齊澤克：《快感大轉移：婦女和因果性六論》，第38頁。

物辯證法主題，從而使其在歷史研究中流標了。

這裏試從作為“真實”的“對象a”這個術語來簡單地展開討論。“對象a”這個在拉康臨床實踐中用來解釋不能解釋之剩餘的概念，齊澤克稱其具有悖論性質，一直以不同的方式來描述它。其中，《快感大轉移：婦女和因果性六論》的一個註釋做了極為清晰的描述：

雖然是想像的，它卻佔據了真實之維的位置，即它是一個非鏡像化的對象，沒有鏡像，同樣地也排斥了任何移情關係、任何同情承認關係。在精神分析過程中，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必須要達到這樣的臨界點，在這個點上他體驗自己與絕對他性之間不可能的同一性。由於——“你就是那個！”拉康的這個觀點已經得到公認，這個事實往往使我們對剩餘快感和對象a——超出任何實際對象的快感剩餘與對象——之間的等號多麼令人驚訝缺乏靈敏反應。也就是說，a恰恰代表了“不可能的”對象，它使永遠不能成為一個實際對象的東西具體化。……對象a意味着力比多不得不被理解為一個對象，一個“無實體的器官”，而不是一個自由漂浮的能量的蓄水池。<sup>①</sup>

這一段解釋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對象a”出其不意地顛倒為主體內部的驅力，涉及齊澤克的分析程序。這種顛倒，在拉康—齊澤克的分析中，便是其所稱的拓撲模式。在他看來，這正是黑格爾辯證法之“惡之循環”<sup>②</sup>。二是作為拉康“真實”能指之所指的“對象a”本身亦是一個能指，它的功能性內涵便是“剩餘”。這個剩餘，作為象徵化過程失敗纔顯示出來的對象，乃是回溯性因果分析的產物。它僅僅表明象徵秩序中的缺失或空位，沒有實際內容。

這兩個要點都顯著地表明，齊澤克對形式分析的依賴。按照其解釋，這種形式分析源自黑格爾的辯證法，其核心在於“共時性相對於歷時性的優先性”。通過這種共時性的形式分析，齊澤克指認作為“\$”的主體不屬於深度，而產生於表面自身的拓撲扭曲。<sup>③</sup>在評論齊澤克的辯證唯物主義時，必須注意這個特點。無論是在對文學、電影等大眾文化現象分析時，還是在談論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時<sup>④</sup>，齊澤克都強調形式對敘事的優先性，極為顯著地表示出對傳統意識形態批評之“歷史化”策略（如詹姆遜）的敵意，以及對“歷史唯物主義”的不友好。然而不得不說，這是一種明顯的失策。因為，無論是阿多諾、馬爾庫塞還是詹姆遜（Fredric Jameson），他們的“歷史化”操作都比齊澤克用黑格爾辯證法之“設定”解釋更深刻地說明了共時性分析之成立的前提，即歷史地形成的“先驗”——歷史地形成的社會條件，這也正是人們創造自己歷史的社會先驗。

有趣的是，正是基於這一邏輯，詹姆遜在1977年便提出過拉康與馬克思主義在唯物主義上的一致性問題。在他看來，精神分析和馬克思主義都強調人類意識並非“自己屋子中的主人”，祇是兩者試圖打破的中心領域並不一致，一個是性問題，另一個則是社會歷史的階級動態。從這個角度，他提出了對拉康“真實”一詞的獨特理解。在他看來，該詞不能指望從拉康那裏得到答案，“它祇不過是歷史本身，而如果對精神分析來說，成問題的歷史明顯就是主體的歷史，那麼，詞語的回聲便暗示着這種特殊的唯物主義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之遭遇不再能夠避免”<sup>⑤</sup>。

如果從形式與內容之間的關係來理解共時性與歷史性分析的關係，那麼可以說，馬克思辯證法的卓越之處在於闡明了形式本身乃是歷史地形成的。這正是《資本論》分析商品形式的前提。在馬克思看來，商品之謎在於其形式本身，然而要說清商品拜物教的機制，卻必須闡明這種“社會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是如何形成的；由此，不僅需要科學地說明資本的原始積累（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或資本生產這種形式所需要的社會條件之歷史的形成），亦需要揭示人類物質生產在這種當下形式中創造的突破其形式發展的歷史趨勢。祇有這樣，纔能為在實踐上打

<sup>①</sup> [斯洛文尼亞] 斯拉沃熱·齊澤克：《快感大轉移：婦女和因果性六論》，第60頁。

<sup>②</sup> Slavoj Zizek,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London: Verso, 2008), 213.

<sup>③</sup> 自我乃是一個表面，這是弗洛伊德的觀點〔《弗洛伊德後期著作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林塵等譯，第174頁〕。

<sup>④</sup> 齊澤克在《因為他們不知自己所為》中關於馬克思原始積累觀點的評論，集中體現了這一點 (Slavoj Zizek,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IV)。

<sup>⑤</sup> Fredric Jameson,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107.

破拜物教指明道路。也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強調：“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採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sup>①</sup>無論阿多諾、馬爾庫塞強調“歷史干預”內容，還是詹姆遜突出“歷史化”視角強調歷史敘事的意義，他們都堅持形式本身的歷史特徵，即作為具體的社會歷史產物的性質，並試圖從中打開新的歷史境域。

在當代資本主義批判中，人們的確無須每一次都重複馬克思關於資本原始積累的分析，嘮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暫時性，因為重點是闡明這種生產方式在當代的最新變遷，從而揭示其不可避免的發展方向，打開新的實踐（即“歷史干預”）。就此而言，突出形式分析無可厚非。這也正是阿多諾“否定辯證法”主張之後的直接動向。但是，不考慮形式本身已經是歷史內容的體現，直接要求剔除了內容的形式分析，反對敘事，必然的結果是：批判可以無比深刻，但卻無法從批判中獲得任何解決問題的方案。這正是拉康—齊澤克所面對的巨大難題。人們已經看到，儘管拉康提出了諸如“穿越幻象”“不要放棄慾望”等口號並且在當代激進左派理論中產生了巨大反響，為各種後殖民的、種族的、差異的、多元的主體鬥爭提供了重要資源，但歸根結底，這些鬥爭也祇是一些倫理主張和文化口號而已。

齊澤克的理論介入，其核心主旨是抵制激進左派理論對拉康的誤讀，試圖在政治上闡明不要對全球資本主義抱有幻想，亦不能指望各種多中心或非中心的主體想像。其理論操作確實不是德里達式解構，而是阿多諾、馬爾庫塞不要肯定的“否定辯證法”：基於“對象優先性”對主客體和解的“同一性”假想進行批判，並在永恆的“非同一性”或“對抗性”社會條件下以霸權鬥爭（即定義普遍性的鬥爭）來維持主體之間開放性競爭。其關於辯證唯物主義的強調，具有特殊的含義，即論證“我”之客觀存在並由此進一步推斷社會之客觀性的唯物主義。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精神分析視角，一種藉由精神分析闡明的認識論唯物主義立場；其核心在於要求承認社會的對抗性質，其意義在於以解釋因果性闡明當代主體的複雜狀況而不是為最終的主體自由之可能性及道路提供歷史論證。這正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激進左派對“歷史終結論”的批評性反應。

這種辯證唯物主義之唯物主義立場是藉由“客體優先性”突出社會之對抗性質和個體主體之對象建構性質來保障的，而其辯證法則是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顛倒，即剔除其內容而強調其形式。齊澤克的《視差之見》對之提供了較為完備的理論說明。在那個文本中，他以天文學上的視差概念作為類比，把“非同一性”“差異”或“不可能性”內化到認識機制之中。一方面，類似於康德關於物自體與現象的區分，將現象之間的差異解釋為同一客體不同現象之間差異而非不同客體之間差異；另一方面，又拒斥將這種差異還原為觀察者位置的變化，而是藉由黑格爾—馬克思不存在外在觀察者的觀點，將主體層面上的“認識論”變化歸結由主體干預的客體本身的“本體論的”變化之反映。他強調：

唯物主義並不直接主張我包含在客觀的現實之中（這樣的主張假設，我的闡述位置是一個能夠把握現實整體的外部觀察者位置），相反，它存在於某種“反思性轉折”（reflexive twist）之中，借助於這種轉折，我自己包含在由我建構的圖像之中。正是這種反思性短路，正是這種我自己——既在我的圖像之中又在其外——的必要再加倍，見證了我的“物質存在”。唯物主義意味着，我所見之現實絕非“整體的”——不是因為其大部分是我看不到的，而是因為它包含了一個表明我含於其中的污點和盲點。<sup>②</sup>

在這裏，齊澤克似乎又提出一種不同的唯物主義定義。這種唯物主義不再依賴於“客體的優先性”，相反，它依賴於主體對自身認知位置的反思。就此而言，它依賴於分析程序。至於齊澤克的這種辯證唯物主義實際分析程序，則需要另一篇文章來專論了。

<sup>①</sup> [德]馬克思：《資本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1卷，第92頁。

<sup>②</sup> Slavoj Zizek, *The parallax view*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6), 17.